

忠王自傳原稿考証與論考據

羅爾綱著

科學出版社

忠王自傳原稿考證與論考據

羅爾綱 著

科學出版社

1958年3月

內 容 提 要

這一部論文集共收論文三篇：一、從太平天國史的考證體會到新舊考據的不同，二、忠王李秀成自傳原稿的真偽問題和史料問題，三、筆蹟鑑定的有效性與限制性舉例（忠王李秀成自傳原稿筆蹟的鑑定）。

關於考據在歷史科學中的作用與地位，是今天史學界還沒有得到一致看法的大問題。新舊考據究竟有怎樣的不同，考據用的是什麼方法，做考據如何去發現問題，又如何去解決問題，考據的對象是什麼等等，很少人論及。作者從太平天國史的考證體會到新舊考據的不同一文，是根據他個人二十多年來所做太平天國史考據的經歷提出來的看法，是值得讀者注意的。

忠王李秀成自傳原稿的真偽問題和史料問題、筆蹟鑑定的有效性與限制性舉例兩文，是作者從 1956 年 11 月讀者展開忠王李秀成自傳原稿的真偽問題爭論以後，更審慎地、全面地、深入地分析問題，比以前更進一步地證實了忠王李秀成自傳原稿的真實性。這兩篇論文，不僅解決了忠王李秀成自傳原稿真偽的問題，也為考證方法提供了實例。

忠王自傳原稿考證與論考據

編著者 羅 爾 綱
出版者 科 學 出 版 社
北京朝陽門大街 117 號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 061 號
印刷者 中國科學院印刷廠
總經售 新 華 書 店

1958 年 3 月第 一 版 書號：1064 字數：115,000
1958 年 3 月第一次印刷 開本：787×1092 1/16
(京) 0001—4,505 印張：4 3/4 插頁：11

定價：(9) 0.85 元

說 明

這一部論文集共收論文三篇：一、從太平天國史的考證體會到新舊考據的不同，二、忠王李秀成自傳原稿的真偽問題和史料問題，三、筆蹟鑑定的有效性與限制性舉例（忠王諭李昭壽書筆蹟的鑑定）。第一篇論文是從太平天國史考證的實踐工作中，體會到新舊考據的不同，第二、第三兩篇論文是對忠王自傳原稿的考證，所以把它們編成一個集子就叫做忠王自傳原稿考證與論考據。

關於考據在歷史科學中的作用與地位是今天史學界還沒有得到一致看法的大問題。新舊考據究竟有怎樣的不同，考據用的是什麼方法，做考據如何去發現問題，又如何去解決問題，考據的對象是什麼等等，很少有人論及。這應該是急須解決的問題。因此，不揣淺陋，謹把我個人研究太平天國史考據的經歷，寫成這一篇從太平天國史的考證體會到新舊考據的不同，以向同志們請教。

自從去年黨提出了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政策以後，學術界呈現了空前的活躍。在太平天國史的研究方面，對忠王李秀成自傳原稿的真偽問題也展開了爭論。這在太平天國史的研究說來，是一個很好的開端。經過這一次爭論之後，大家作深入的徹底的研究，預卜不久的將來，一定可以得到最後的結論。因此，我也不揣淺陋，寫成了忠王李秀成自傳原稿的真偽問題和史料問題、筆蹟鑑定的有效性與限制性舉例（忠王諭李昭壽書筆蹟的鑑定）這兩篇論文，以向同志們請教。

一九五七年六月十二日羅爾綱謹誌於北京。

目 次

從太平天国史的考證體會到新舊考據的不同.....	(1)
忠王李秀成自傳原稿的真偽問題和史料問題.....	(25)
筆蹟鑑定的有效性與限制性舉例(忠王諭李昭壽書筆蹟的鑑定).....	(63)

從太平天国史的考證體會到 新舊考據的不同

一 引 言

新考據是與舊考據不同的。必須明確認識了新考據與舊考據的不同，然後才能够認識清楚新考據在歷史科學的研究工作中的作用與地位，也才有利於歷史科學的研究工作。

關於考據的作用與地位，今天還沒有一致的看法。其中有一種，雖然還沒有成為定論，但却得到了多數人同意，它包括兩方面：

第一、把乾嘉學派的考據過高估價了。他們雖然指出乾嘉學派考據方法不能探求本質與規律的局限性，但却認為它可以完全擔任鑑定史料、詮釋史料、考證史事等顯示史事的真實現象的任務。

第二、不加區別地把今昔的考證方法都認為祇限於使用形式邏輯。

其實，乾嘉學派的考據方法，在它所使用的形式邏輯所能為力的小範圍內，是會得到一些正確的結果的。如王念孫的讀書雜誌、廣雅疏證，王引之的經義述聞等書，不出名物訓詁校勘等的範圍，大都是形式邏輯的思維方法所能解決的問題，他們謹嚴地運用這一個方法，因此就能夠做得比較謹嚴、比較正確的結果。但一超出這個界限，這種舊考據方法就無能解決。

至於乾嘉學派舊考據所用的方法，和今天新考據所用的方法二者是不同的：乾嘉學派舊考據用的祇是形式邏輯，在形而上學思維方法指導之下進行考據；而今天新考據以辯證邏輯居於領導地位，形式邏輯祇作為技術性的方法，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指導之下進行考據。二者所用方法的不同，指導思想的不同，是不同的世界觀人生觀所決定了的。說得明白些，是階級立場所決定了的。

爲了要說明乾嘉學派舊考據方法的局限性，和今天新考據方法跟它有何不同，首先要在下節把我從太平天国史考證的實踐中得來的體會提出來說說。

二 從今昔工作的對照中看出新舊考據方法的不同

我在解放前做的太平天国史考據工作，長期受了乾嘉學派舊考據方法的局限，和深重的束縛。乾嘉學派考據方法的片面性與局限性，恩格斯在反杜林論一書中有一段話論形而上學的思維方法說道：

“形而上學者思維於絕對不能相容的對立之中。他的說法是：‘是則是，否則否，除此以外即是鬼話。’在他看來，事物或是存在，或是不存在；同樣地，某一事物不能同時是自己又是其他事物。正和反是絕對互相排除的，原因和結果也彼此處於固定的對立之中。這種思想方法，我們初看起來似乎是很有理的，因為它正是合乎所謂常識的。可是人的常識在家庭四壁之內的生活範圍中，雖是極可尊敬的伴侶，但是一踏上廣大的研究的世界時，它立刻就會經歷最可驚的變故。形而上學的思想方法，雖然在某一多少寬廣的領域中（寬廣程度要看研究對象的性質而定）是合用的，甚至必要的，可是遲早它總要過着一定的界限，在這界限之外，它就變成片面的、局限的、抽象的，而陷於不能解決的矛盾之中了；因為它只看到個別的事物，而看不見它們相互的聯繫；只看到它們的存在，而看不見它們的產生和消滅；只看到它們的靜止狀態，而忘記了它們的運動；只見樹木而不見森林”。^①

這段話正好用來說明乾嘉學派舊考據方法的片面性與局限性。舊考據方法所能做到的只是在用“人的常識”可以處理的範圍中，也就是說初等的形式邏輯的思維方法可以運用的範圍中，再加上研究者的詳細佔有材料和謹慎的工作，那是可以得到一些正確的結論的。這是因為在一定的時間內和一定的具體條件下，某一歷史現象是可以被視為已經形成的相對地分離的、穩固的和確定的史實的；這就是恩格斯所說的“某一多少寬廣的領域”，這裏初等的形式邏輯的思維方法是可以合用的。但這種方法“遲早地總要過着一定的界限”，一超過那一個界限，那時它的片面性和局限性就完全暴露出來了，“而陷於不能解決的矛盾中”。所以運用舊考據方法祇能解決一些簡單的尋常關係的事項，例如一部史料的辨偽，如江南春夢庵筆記的考偽、太平天國戰紀的考偽等；一件文物的辨偽，如太平天國貨幣辨偽、石達開假詩考等；一部書的校勘，如天條書版本的校勘、資政新篇版本的校勘等；曆日的對照，如天曆與陰陽曆日對照的問題等等。如果問題的關係比較錯綜複雜時就沒有解決的能力了。舊考據方法通常用的都是舉例為證的列舉式的歸納法，不僅這種列舉式的歸納法如此，即使是有原則地選取歸納材料的科學的嚴格的歸納法，它所能達到的成就和辯證法相比較，也還是不完備的。列寧在哲學筆記裏曾經指出：“用最簡單的歸納方法所得到的最簡單的真理，總是不完全的，因為經驗總是不完備的”。可見要研究關於社會歷史發展的最複雜的科學知識，舊考據所用的初等的形式邏輯的歸納法是無能為力的，而必須進一步應用高級的邏輯——辯證唯物主義的邏輯。

我通過六年來重寫和新寫太平天國史考據論文，我體會到新舊考據方法的不同，我檢查出了舊考據方法的片面性、局限性，認識到新考據方法的全面性、正確性；我看出了形而上學思維方法的破產，認識到唯物辯證法的優越。茲分述於下：

① 恩格斯“反杜林論”，一九五六年人民出版社出版，吳黎平譯本二十頁。

(甲) 舊考據方法是片面地、孤立地看問題，祇有新考據方法才能够全面地、聯繫地看問題

舊考據方法本身既有片面性、局限性，它又在形而上學的思維方法指導之下做考據，就祇能够片面地、孤立地看問題，而不可能得到歷史的真實，甚至導引到錯誤的結論去。

例如我在一九三七年一月在商務印書館出版的太平天國史綱裏，曾經指出太平天國是“貧農革命”(九八頁)，太平天國代表貧農，曾國藩代表地主，這次革命，是“統治者與被統治者的鬥爭”(六七頁)。我這一個看法，原則上還沒有錯誤。到一九四四年我用舊考據方法進行太平天國革命的背景這個專題的時候，主要的目的是要進一步探求太平天國革命的根本原因。可是，我所能看見的只是個別的事物，而看不見它們的互相聯繫；我所看見的只是一大串紛亂的因素，而抓不住那一個作為太平天國革命最主要的最根本的原因的農民階級與地主階級的鬥爭來做研究的中心環節，從而捨本逐末，迷失方向，把太平天國革命的原因羅列為：人口壓迫、豪富兼併、耶穌教與鴉片、災荒、政治腐敗、民族思想與會黨六個因素，平均對待各種大大小小的因素，分散力量去注意各種支離破碎的孤立的問題。結果，沒有考據得出階級鬥爭是太平天國革命的決定原因，却一直向着各種支離破碎的問題去鑽牛角尖：從人口壓迫追溯到明代蕃薯、玉蜀黍的輸入及清代乾隆後的傳播；從長江水災追溯到長江水患的起源；從鴉片戰爭追溯到鴉片的輸入與對資本主義國家鴉片吸食鴉片始自中國人的訂認。這樣，就對研究太平天國革命原因的目的離題十萬八千里！當時我在前社會研究所工作，寫成這本稿子，送給所長陶孟和先生看。他看了說：“可惜化費了這樣大力，得來的結果，祇見樹木，不見森林。”我自己也十分迷惘，自嘆無能。一直到今天檢查，才知道原來是舊考據方法和形而上學的思維方法給我的局限，給我的束縛。

又如我在二十年前就曾經考證過天朝田賦制度。天朝田賦制度是太平天國反封建的綱領，包括有廢除地主階級土地佔有制的土地法，廢除私有財產的聖庫制度，生產資料收歸國有、工業歸國營的諸匠營、百工衙制度，還有人民選舉鄉官的民主制度，和婦女解放等等，而其中則貫串着一個反封建的綱領。如果把這些內容割裂開來孤立地去看，就看不出它的內部的聯繫，也就看不清楚這一個貫串其中的反封建的綱領。我那時候，在舊考據方法的局限之下從事考據，正是這樣錯誤地把其中的土地法、聖庫制度、諸匠營與百工衙制度、鄉官制度、婦女解放等等割裂開去一個個地單獨地去做考據。因此，我所能考得出來的當然祇是一個個孤立的史實，而無從看得出它們正是從一個綱領出發的一系列的政綱、政策，因而就不可能在這一個作為太平天國革命最主要的綱領考證裏面，對太平天國革命的性質問題提得出是一個反封建的農民革命的科學說明出來。

舊考據方法不僅在研究大問題上有那樣的局限性，就是以考證一個人物的問題來說吧，例如關於太平天國有無天德王洪大全這一個人物的考證，我用的力量不能說不專，時間不能說不久，但是，我從前考證這一個問題，完全不懂得應該從天地會的制度根本不可能產生一個代表全會勢力的大領袖，太平天國在廣西永安州的時候領導集團裏面並沒有一個代表天地會勢力的領袖參加，在洪大全被俘之後，太平天國也沒有排斥天地會、拒絕天地會加入的事等方面去考察問題，而僅僅是從洪大全供的真偽一點上拚命去鑽牛角尖，一九三五年第一次寫洪大全考時是這樣，到一九四六年重寫天德王洪大全考時也是這樣，所以問題始終得不到解決。直到一九五四年我第三次寫洪大全考時，我初步受了馬列主義的教育，看問題的方法不同了，才檢查得出過去在考證這一問題上所犯的錯誤，因而才把問題解決了。從我過去所做的洪大全考證上，也具體地說明了舊考據方法所給我的局限，使我只懂得片面去鑽牛角尖，而不懂得全面地去看問題。

由此可見，舊考據方法祇能個別地、孤立地看問題，而不可能全面地、聯繫地看問題，所以不可能解決具有複雜錯綜性的歷史考據問題，就是那些牽涉範圍較廣的歷史考據問題也難於得到解決。只有新考據方法，才能够擔負起這種任務。

(乙) 舊考據方法是從現象看問題，祇有新考據方法才能够從本質看問題

舊考據方法是從現象看問題，所以祇能够考出浮在表面的歷史現象，祇有新考據方法才從本質去看問題，探求得出史事的真象。試舉太平天國爲什麼不准繪人物這一個問題的考據爲例。

太平天國不准繪人物問題，自從一九五二年南京堂子街發現太平天國壁畫考出太平天國不准繪人物這一件史實之後，觀衆就提出：“太平天國爲什麼不准繪人物呢？”這一個問題來。最初我們以爲，中國以前的人物壁畫，是給佛、道宗教和封建禮教作宣傳，爲封建統治服務的。太平天國的壁畫却是專爲宮室建築物的美觀裝飾服務的，故不准繪人物，而專取宜於做裝飾性的山水花鳥之類的自然景物作爲畫題。這一個看法，我們不久看出是陷於形而上學孤立的、割裂的看問題的錯誤，把它放棄了。後來，我們從舊約進行考據，考出舊約禁止繪人物，得出太平天國不准繪人物是遵守舊約的禁條，是爲了尊崇上帝。但是，舊約不但不准製作神像和人像，也不准製作“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的形像；舊約不但反對壁繪人像，也同樣反對壁繪“各樣爬物，和可憎的走獸。”而太平天國祇根據舊約不准繪人物，然而却大繪特繪飛禽走獸，並沒有完全遵守舊約的禁條。這就可見太平天國雖然抬出了舊約的上帝，但它只利用了這一個上帝對它有利的方面，而對它的革命鬥爭沒有好處的方面却毫不理會。這就可見太平天國利用舊約不准繪人物的宗教信仰，祇是現象形態，而不是事物本質。所以這一個“爲了尊崇上帝”的看法，仍然是受了舊考據方法從現象看問題的局限。於是我們突破了這一個束

縛，以新考據方法從本質看問題，進行深入的研究，然後得出了太平天國不准繪人物，目的是爲了革命的鬥爭。它並不是什麼宗教的信仰，而是有其重大的政治意義和巨大的反封建作用。它是在思想戰綫上經常地（不分早期、晚期）普遍地（不分中央、地方）使用的對外打擊敵人對內集權的武器之一——這一個結論。

我們從太平天國爲什麼不准繪人物這一個問題的考據，可以很清楚地看出舊考據方法祇能從現象看問題，考得出浮在表面的現象形態，祇有新考據方法才能從本質看問題，探求得出掩蔽在現象後面的歷史真象。

（丙） 旧考据方法是“是則是，否則否”地看問題，祇有新考据方法才能够从矛盾对立之中去看問題

歷史事實往往是複雜錯綜的，在發展的過程中有着矛盾存在的。由於舊考據方法是用形而上學的“是則是，否則否”地去看問題，所以不可能解決此種問題。祇有新考據方法在唯物辯證法指導之下才能够從矛盾對立之中去看問題，探尋得出史事的真象。試舉浙江紹興太平天國壁畫的考據爲例。

紹興市內現在相傳有二十多處太平天國繪的壁畫。這些壁畫，繪有龍、鳳、獅、象、虎，還繪有神怪故事。龍、鳳等壁畫，十分殘破，但神怪故事壁畫却保存得還完整。我們經過調查、研究，根據許多方面已經肯定的事實，肯定了龍、鳳、獅、象、虎等壁畫確是太平天國的壁畫，而對那些存在着種種疑問的人物神怪壁畫，則提出了是由於紹興地主階級誣毀太平天國用人血繪壁畫，誣毀太平天國在房子裏殺人埋死屍，所以在太平天國退出紹興後，有些地主階級的家，便在太平天國繪過壁畫的牆壁上，另繪上與太平天國信仰對立的東西而爲他們所崇奉並且認爲可以“闢邪”的神佛人物故事來加以“厭勝”。因爲這些壁畫，是當太平天國失敗之後，就在太平天國繪過的壁上繪的，所以一代代傳下來便誤傳是太平天國的壁畫這一個假設性的解釋。我們處理這個複雜、矛盾的問題，是把真的肯定它是真的，把假的提出它是假的，而假之所以作真，是由於假的是在真的位置之上繪的，所以才把假的誤傳爲真的。這是必須從矛盾對立之中去看問題才看得出來的。可是，我在一九五三年初研究這問題的時候，還受着舊考據方法“是則是，否則否”地看問題的束縛，我那時候看來，認爲這些壁畫應該全部否定的，完全看不出假中有真，假的還是從真的遺蹟上重繪誤傳下來的這一個事實。後來經過一年多長的時間，極力地打破舊考據方法的束縛，不斷地思考，才在複雜、矛盾的問題之中，逐漸地看得出來。

我考證紹興壁畫的經歷，說明了舊考據方法“是則是，否則否”地看問題的方法的無能爲力，祇有新考據方法才能從矛盾對立之中探尋得出歷史的真象。

（丁） 旧考据方法是靜止地看問題，祇有新考据方法才能够發展地看問題

舊考據方法靜止地看問題，不可能了解史事的產生、發展和變化。祇有新考據方法才能發展地看問題，探求得史事的產生、發展和變化的真象。

例如研究太平天國思想有兩部主要的文獻，一部是太平詔書，另一部是天條書。這兩部書有兩種不同的版本：一種版本引用了不少儒家的話；另一種版本把這些話都刪去了。蕭一山在一九三三年做太平詔書和天條書跋，憑他的主觀臆斷硬說太平天國原來是宗教性很濃厚的，“當其初起，惟以尊上帝拜基督為事，舉中國一切之聖賢傳胥毀棄之”，後來曾國藩起湘軍以名教奇變為號召對抗太平天國，所以太平天國“積數年之經驗，因社會之情形，不得不翻然變計”，就在這兩部作為教育宣傳的主要的文件上，多“增入中國典訓名言”，“故為佐證”，付之重刻，以遷就人心。^①蕭一山這一種說法是主觀臆斷。我用舊考證方法從太平詔書和天條書兩種版本的校勘，從太平天國所行的舊喪禮和新喪禮的制度，再參以太平天國刊刻的舊遺詔聖書的初刻本和改正重刻本的校勘，指出蕭一山說法的錯誤，證實了太平詔書和天條書援引儒家經典的是初刻本，不引儒家經典的為改正重刻本。但是，舊考據方法所能為力的到此為止，而不可能解釋其原因。祇有掌握新考據方法，從發展看問題，才能提得出：洪秀全本來是儒生，久受中國傳統思想的薰陶，雖以耶穌教發動革命，而起初所認識的教義僅限於梁阿發的勸世良言，因此，那時候他寫的教育宣傳文件就多援引儒家思想與術語，不能出其範圍，後來宗教性越來越濃厚，到癸亥三年建都天京後，草創漸定，“萬樣更新”，於是乃有刪書之舉，以謀思想上的統一這一個解釋出來。從這一個例子，舊考據方法雖然可以考證得出事實的現象，但由於受着靜止地看問題的方法所局限，不可能探求得事實發生的底蘊。要探求事實發生的底蘊，就必須進一步使用新考據方法。

我受舊考據這一種看問題方法的束縛是很深的，解放後還未能把束縛完全解除，這就表現於一九五四年重寫的天朝田畝制度的實施問題一文上。天朝田畝制度的產生，主要是太平天國依據自己革命運動中實踐的經驗而來。金田起義的時候，參加革命的人都帶了全家老小到軍隊中間來。既然全家都參加了軍隊，一切衣食都祇能依靠公家供給，太平天國適應這種需要，實行統一供給制。這種嚴格的軍事共產主義制度，使太平天國軍費開支節省，幫助了革命獲得初期的勝利。等到定都天京後，就把在軍隊中行之有效的供給辦法，依附原始基督教義，文飾以周禮的條文，頒布了一套天朝田畝制度。這種制度，土地全歸國有，平均分配給農民耕種，土地的收穫物除足“所食可接新穀外，餘則歸國庫”，所有婚娶、喪葬、生孩子等事，都照一定限額向公庫支領。對工業和商業也都收歸國有，禁止私營。這是一種阻礙生產發展的空想的農業社會主義，結果造成天京糧食匱乏、物資斷絕的情況。太平天國了解這種情況後，就不得不把天朝田畝制度

① 見蕭一山編太平天國叢書第一集太平詔書跋。

的推行停止，准許農民“照舊交糧納稅”，也准許工商業的私營。所以考據這一個問題，必須以發展觀點作為指導思想，研究它的產生、發展、變化的底蘊，然後才能够得到一個完整的認識。我沒有這樣做，却把天朝田畝制度的產生、發展、變化個別地孤立地進行考據，而沒有從發展觀點去解釋問題，因此，在我的考據論文中，雖然考得出事實，但對事實之所以產生、發展、變化的底蘊却沒有解釋得出來，這樣，就使讀者對這一個制度得不到一個發展的觀念，也就對它得不到完整的認識。這說明了我那時候仍不能解除舊考據方法靜止地看問題的方法的束縛，也說明了舊考據方法靜止地看問題的方法對研究問題的極大的局限性。

(戊) 舊考據方法是無視或掩蓋階級鬥爭，祇有新考據方法才能够正視和揭露階級鬥爭

舊考據方法無視或掩蓋階級鬥爭，為封建主義、資本主義服務。祇有新考據方法，才能够正視和揭露階級鬥爭，發掘出階級鬥爭的歷史事實，看出歷史的真象。

例如在太平天國史的研究中，有一件大事，就是天京之所以不能保守，是由於生產遭到了徹底的破壞。當時安徽、江蘇、浙江三省幾乎到處都是“村市平毀，農田全荒，白骨荆榛，絕無居人”^①的可怖現象。這三省是給誰破壞了呢？地主階級口口聲聲說是太平天國破壞。我在一九四四年做了一篇世傳太平軍奸淫殺戮考證，^②雖然極力在替太平天國辨誣，但是，我那時候由於受了舊考據方法的局限，停留在現象的階段上，而不懂得從本質上看問題，深入地去追索。到一九五四年重寫這篇考證的時候，我再看曾國藩沿途察看軍情賊勢片，^③才恍然大悟，大殺、大燒正是以曾國藩為首的反革命武裝進攻太平天國的一個極毒辣的手段。據曾國藩說，在太平天國壬戌十二年（清同治元年）反革命發動進攻以前，太平天國的情況是：“擯長江之利，挹不竭之源，傍江人民亦安之若素”。但是，為什麼一到反革命進攻之後，就會造成“男婦逃避，煙火斷絕，耕者無顆粒之收，相率廢業”呢？不管曾國藩如何地歪曲事實，如何地誣譏太平天國，而這一種燒殺的罪行都完全是反革命幹的，因為反革命的目的，是要使太平天國軍隊“行無民之境，猶魚行無水之地”，^④太平天國政權“居不耕之鄉，猶鳥居無木之山”，^⑤所以就用搶光、燒光的毒辣手段把安徽、江蘇、浙江三省的生產徹底破壞了。由此我們不僅可以粉碎了地主階級對太平天國的誣譏，而且可以明確地斷定這一件殘民以逞的大罪惡正是以曾國藩為首的地主階級幹的。但是，如果不從本質上去看問題，就不可能剝開曾國藩的誣譏，而從誣譏的言辭裏面看出了事件的真象。這是舊考據方法所不能為力的，祇有站在人民的

① 見剿平粵匪方略卷三百七十一李鴻章奏。

② 此文收在一九四八年出版的拙著太平天國史考證集內。

③ 見曾文正公奏稿卷十八。

④⑤ 都見曾國藩沿途察看軍情賊勢片。

立場，才能够看得出階級鬥爭的歷史真象。

又如王韜，許多人都認為他是同情太平天國的人，所以他才向太平天國上書論攻上海事。我在一九三四年寫上太平軍書的黃曉峯的時候，用的是舊考據方法，所以祇考得出黃曉峯就是後來辦申報的王韜為止，至於王韜為什麼要向太平天國獻策却無法考得出來。這一次重寫黃曉峯便不同了，我能够初步從本質上去看問題，把那些隱蔽的事實看出來了。首先是從王韜向太平天國獻策前就在上海吃了英國侵略者的先鋒隊傳教士的飯共十二年之久，他跟英國侵略者有過長期的關係。就在獻策那一年，他又跟英國海軍提督何伯（J. Hope）參贊巴夏禮（H. S. Parkes）做隨員到天京去窺探太平天國和到漢口去與清朝統治者勾結。據王之春中外通商始末記說，美國侵略分子華爾（F.T. Ward）統率的洋槍隊便是清朝蘇松太道吳煦採納王韜的建議來建立的。根據王韜這樣的歷史與行動來分析，他斷不會替太平天國打算而向太平天國獻策的。又據英國公使卜魯斯（Bruce）所說，知道王韜所以向太平天國獻策是因為當時王韜全家從外國侵略者霸佔的上海搬回他的家鄉——太平天國治下的蘇州去，爲了避免太平天國對他的嫌疑，故獻此策假作與太平天國“同心之論”。而王韜之所以全家搬回蘇州，是由於太平天國大軍進攻上海，英國侵略軍的增援軍隊還沒有趕到，上海情況慌亂，故搬回蘇州來。再根據英國增援軍到滬後，王韜就返上海，與後來清政府因王韜上書太平天國要逮捕他時，英國公使對王韜極力保護等事看來，王韜向太平天國獻這一個主張用兵上游不攻上海的策略，很可能是受英國侵略者的指使，企圖太平天國延緩進攻上海的軍事行動，爭取時間，等候增援的。這一件事，對太平天國反侵略戰爭是有關係的，應該作為這一篇考證的主要問題之一。可是，在用舊考據方法去考證這一個問題，却不可能接觸得到這一個問題的核心，祇有新考據方法才能够把事實發掘出來。

由此可見，舊的考據方法是無視或掩蓋階級鬥爭，爲封建主義、資本主義服務。祇有新考據，才能够正視和揭露階級鬥爭，發掘得出階級鬥爭的歷史事實，看出歷史的真象。

（己） 旧考据方法是無視或蔑視群众，只有新考据方法才会有群众观点和走群众路綫

舊考據方法無視或蔑視羣衆，看不出人民羣衆的力量，也就難免導引到錯誤的結論，更不知道走羣衆路綫，去解決問題。祇有新考據方法才具有人民羣衆的觀點，才知道依靠羣衆。

例如用舊考據方法去研究太平天國採用明白易曉的語文的問題，得出來的是洪秀全個人提倡的結論。而我們用新考據方法去研究，才看出洪秀全原來是一個深受古典文體束縛的知識分子，他在最初圖謀革命的時候寫的幾篇文章還不曾打破封建古典文體的束縛，特別是原道救世歌一篇，更是典實連篇。這些文章，當然不是人民羣衆

所能領會的，但當時洪秀全是關門寫作，他沒有認識到羣衆的要求。到了清道光二十七年（公元一八四七年）六月，他到廣西桂平縣紫荆山設立拜上帝會機關，分送他所寫的文件到附近各縣農村進行宣傳之後，他接觸到羣衆的面一天比一天廣，一天比一天深了，才深切地認識到他的作品中所用的那些文體不是羣衆所能領會的，羣衆所要求的是聽得懂看得懂的明白如話的文體。因此，他就打破封建古典文體，寫作明白如話的文章以符合羣衆的要求。洪秀全通過他的革命實踐，明確了羣衆的要求，到了太平天國癸好三年（公元一八五三年）建都天京後，就提出反對封建文學提倡白話體文學的革命政策。這就可知太平天國反對封建文學的主張，並不是洪秀全個人想出來的，而是反映人民的要求、站在人民羣衆的基礎上提出來的。^①又如用舊考據方法去研究太平天國提倡壁畫的問題，得出來的是太平天國因為壁畫是中國勞動人民的藝術，所以就大力提倡壁畫的結論。而我們用新考據方法去研究，才看出這一個作為農民革命的羣衆所痛恨的是那標志着對農民的血腥掠奪的掛在地主階級高樓大廈的卷軸畫，而為他們所理解的、所“喜聞樂見”的却是中國老百姓向來所愛好的壁畫，在革命鬥爭中，又增加他們對壁畫形式的愛好。因此，到建都天京後，就在一些新建築和廣大的舊建築上普遍地繪製壁畫起來，它刪除了與革命鬥爭抵觸的佛、道人物畫和封建人物畫的舊內容，而發揚了有利於革命鬥爭的和美化生活的山水花鳥畫和富於戰鬥性的飛禽走獸畫的新內容，從牆壁棟樑以至門扇，無一不繪。天京以外，各地也普遍地繪制壁畫，只以天京一地而論，在失陷之後，經過清軍焚燒毀壞，還有一千多處。當時壁畫的盛況可以想見。這就可知，太平天國的提倡壁畫，不是主觀盲目的，而是有廣大的羣衆基礎的，太平天國壁畫所以得到這樣的蓬勃的發展，就是建築在這一個羣衆的基礎上。

舊考據方法更夢想不到走羣衆路線，只有新考據方法才知道依靠羣衆去解決問題。我們幾年來做浙江紹興太平天國壁畫的調查，南京如意里太平天國壁畫的調查等，都是依靠羣衆解決了問題。而最突出的一件事例，是南京普渡菴的調查。原來南京市民魏伯和在一九五〇年提出一個所謂“天王元妃”——興義尼出家普渡菴的事件，他自己以興義尼歸依弟子的身份向政府報告，他糾約了幾個生存的人作證，他舉出了幾個過去的實有其人的人或無事蹟可查的人作證，他還舉出了一些無可追尋的文件和捏造了一些文件作證。他建議政府在普渡菴建碑紀念，保護革命遺蹟，並申請政府照顧他個人的生活和他兩個堂妹的就業問題。政府把他的意見交我們研究，我們從歷史考證指出他所說的事件的虛假。他不服，一次又一次地向政府上書，我們也一次又一次地根據歷史事實指出他的虛假。他仍不服，最後一直上書到毛主席。政府為慎重對待革命傳說及人民意見起見，交我們作進一步的研究。我們大家研究這問題，認為魏伯和所提出的事件，是已經一次又一次地經過歷史的考證完全證實他的虛假了的。但是，魏伯和是

① 請參看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拙編太平天國文選自序。

生存的人，他捏造這一樣事蹟被揭穿了，他還可以再捏造另一樣事蹟；他可以糾約活人作證，他也可以捏造死人作證，他還可以捏造假文件來做證明，總之，歷史考據可以否定他的種種虛假，但歷史考據却無法揭穿他作偽的根由。必須揭穿了他作偽的根由，他才再沒有話說。而要把他作偽的根由追尋到水落石出，只有依靠羣衆，深入到羣衆中去作縝密的細緻的調查，羣衆的眼睛是雪亮的，羣衆的觀察是尖銳的，只有依靠羣衆，才能够徹底地解決問題。因此，南京市文物保管委員會決定組織人力，深入到當地羣衆中去進行調查工作。經過了一個多月的調查，詳細地訪問了具有極大的代表性的人物，結果，揭穿了魏伯和捏造所謂“天王元妃”的動機的祕密，就是曾經一度給魏伯和作證的果修也不敢再在羣衆面前再作“假見證”。這一事件，終於依靠羣衆徹底地解決了問題。

由此可見，舊考據方法無視羣衆，看不出人民羣衆力量，也就難免導引到錯誤的結論，更不知道走羣衆路線，去解決問題。只有新考據才具有人民羣衆的觀點，探求得出歷史的真象，才知道依靠羣衆，去解決難以解決的問題。

以上所舉六項，祇是就我個人實踐中的體會舉出來說的，當然不祇這些。但是，祇就這六項看來，就已經可以很清楚地看出了新考據方法和舊考據方法的不同：舊考據方法是片面地、孤立地看問題，是從現象看問題，是“是則是，否則否”地看問題，是靜止地看問題，是無視或掩蓋階級鬥爭，是無視或蔑視羣衆，它具有極大的局限性和片面性；祇有新考據，才能够全面地、聯繫地看問題，才能够從本質看問題，才能够從矛盾對立之中去看問題，才能够發展地看問題，才能够正視和揭露階級鬥爭，才會有羣衆觀點和走羣衆路線，它具有極大的正確性和優越性。新考據方法，所以得具有這樣的正確性和優越性，是由於它所用的是高級的辯證邏輯，同時不僅不排斥有局限性的初等的形式邏輯，並且把舊考據方法所用的形式邏輯的技術，作為寶貴的遺產而予以批判的接受。

三 考據的技術問題

舊考據方法用的是形式邏輯。形式邏輯乃是關於正確思維的規律的科學，它的對象是正確思維的規律，而正確思維是毫無矛盾的、互相聯繫的、首尾一貫的、根據充足的，並且導引到正確的與現實適應的結論。形式邏輯規定着思想的必要條件，不論思想的對象為何，不遵守形式邏輯的規律，思維便不能正確，不能導引到正確的結論，不能達到對現象的認識。但是祇遵循形式邏輯底規律，却不能保證對現實的認識。遵循形式邏輯的規律是對現實的認識的必要條件，但是僅僅遵循形式邏輯的規律，對於認識現實是不夠的。要正確而完整地認識現實，必須應用探討現實的唯一科學的方法——唯物辯證方法。

馬克思主義者是辯證地思維的，對於他們，在其研究中起領導作用的是辯證法。但

是，科學思維、研究，在應用唯物辯證方法時，是不能忽視形式邏輯規律的，因為忽視形式邏輯規律就會在思維中起錯誤，會引起關於各種現實現象的不正確的結論。

顯然地，必須規定形式邏輯與唯物辯證法的互相關係，確定它們的差別及其聯繫。不正確地解決形式邏輯與唯物辯證法底相互關係，就能導引到最有害的、否定的結果，就能引起對現實的不正確的認識，對現實的歪曲的和曲解的說法，就是說，不是導引到真理，而是導引到錯誤的結論。相反地，如果正確地解決了這個問題，便可能利用形式邏輯規律作為認識現實的工具。^①

新考據方法不排斥舊考據方法所用的形式邏輯，正同唯物辯證法不排斥形式邏輯一樣。而在新考據方法中，起領導作用的乃是唯物辯證法，那些形式邏輯的方法，却祇是屬於技術性的方法，不能與起領導作用的唯物辯證法等同。但是，必須規定它們之間的互相關係，確定它們的差別及其聯繫，然後才能夠很好地利用這些技術性的方法作為考據的工具。

關於在新考據方法中作為領導作用的唯物辯證法與作為技術性的形式邏輯的方法底差別及其聯繫，在論新舊考據方法的不同一節中已經大略地說過了。在這裏，要專對屬於形式邏輯的技術性考據的方法說說。

說到技術性的考據方法，在中國，乾嘉學派的學者畢生盡瘁於考據，但卻沒有一人寫過一部論考據方法的專著。如果說他們祇繡鴛鴦給人家看，而不肯把金針度給人，那不會是事實。一種雖然可說是含有科學萌芽性質的學術，而沒有理論指導把它總結起來，也難於談到方法的。乾嘉學派的學者正處在這樣的一個狀態中，所以他們雖然畢生盡瘁於考據，他們祇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地埋頭做他們的工作，而不可能總結一個方法出來。我自己，在解放前做了長期的考據，也糊裏糊塗地跟前人差不多。直到解放後，開始學習了馬列主義的理論，經過了六年多改寫舊作和考據新题目的實踐，對自己所用的技術性的考據方法不能說沒有初步的認識，但是，由於理論水平很低，我的認識就難免於十分膚淺的。

現在把我對技術性的考據方法那些十分膚淺的認識分為怎樣去發現問題、怎樣去考證問題和怎樣去檢驗假設三方面寫出來請讀者指教。

（甲） 怎樣去發現問題？

考據最大的一個作用是“去偽存真”，因此，談考據方法第一步就是怎樣去發現問題。

問題在於偽造的史料、虛假的史事和錯誤的論著。要發現出那些偽造的、虛假的、錯誤的問題，首先就要抓住它的破綻，也就是與真實歷史矛盾的地方。毛主席說：“什麼叫問題，問題就是事物的矛盾。”^② 這就必須小心翼翼地觀察，小之可以從一事一物發

^① 此處論述，節錄自蘇聯斯大林著邏輯第三章形式邏輯與唯物辯證法。

^② 見毛澤東選集第三卷八六〇頁。反對黨八股。

現問題，大之可以從階級立場發現問題。

例如自清末殘山剩水樓刊本石達開遺詩出版之後，石達開詩鈔、先生詩話、龍潭室詩話、說元室述聞、太平天國野史、太平天國詩文鈔等書都競相轉載，石達開詩名喧騰一時，沒有人指出它的虛偽。我根據石達開的出身和一生歷史，抓住那些偽作的破綻，發現了問題，於是進行考據，考出了今天所見石達開詩，除廣西慶遠白龍洞題壁一首外，全部都是後人偽造的。後來柳亞子發表題殘山剩水樓刊本石達開遺詩後和題盧冀野輯石達開詩鈔後兩篇跋文，告訴讀者殘山剩水樓刊本石達開遺詩，除其中答曾國藩五首見於梁啟超飲冰室詩話外，餘二十首都是他的亡友高天梅（旭）在清末鼓吹革命時假造的，當時集錢印千冊，流布四方，柳亞子便是參加刊布的一人。柳亞子的跋文，證實了我的考據。^①

又如在太平天國史料裏有一部最眩暈人們的大偽書，叫做江南春夢庵筆記，署名武昌沈懋良撰。這部大偽書首先虛構說著者沈懋良是在太平天國壬子二年在武昌被編入贊王蒙得恩部下，後來做蒙得恩的親近侍從，直到天京失陷前一天還在天京。書中用了種種障眼法來欺騙讀者，使讀者深信它的真實性。接着就肆意虛構了許多太平天國事蹟，從而誣毀了太平天國革命，混亂了太平天國史實。三十多年來，凡研究太平天國史的或評論介紹太平天國史料的人，沒有一人不深信這部大偽書。有人根據它來考證太平天國的律法與印行的書籍，有人根據它來考證天朝田畝制度與太平天國的考試制度和省制等等，有人根據它來證明太平天國曾追封洪大全為愍王，證明確有天德王洪大全其人其事。人們在考據太平天國史的工作上，幾乎沒有例外都把它記載作為斷定太平天國史事最重要的根據，即使遇到文獻具在，記載分明，千真萬確的史事，而因為它獨有不同的異說也竟引以為疑。因此，這部大偽書由於大家受了它的欺騙，才致於以偽亂真，紊亂了太平天國的真實歷史，發生了嚴重的惡影響。其實，這部大偽書雖然用盡了欺騙的技倆，但是，如果讀者小心的去觀察它，任何障眼法都遮掩不了它的欺騙，就一定能够拿得住它的破綻。關於這部大偽書，我已經寫了一篇長篇的考證，不僅證實了它的種種虛偽，而且直追出了它作偽的娘家。^②在這裏不能把那些考證列舉出來，祇說我是從什麼地方發現它的作偽出來。我發現作偽者作偽首先是在書中所述叙贊王蒙得恩的事蹟上，據著者自述說他是蒙得恩最親近的侍從，連蒙得恩“內室”情況都知道的那樣一個關係密切的人，可是，他記載蒙得恩金田起義時的年歲“僅十九歲”，而我們根據蒙得恩的兒子幼贊王蒙時雍致叔上信等家書說，金田起義時，蒙得恩在金田入營，蒙時雍在平南縣花洲入營。如果金田起義時蒙得恩確如所說僅十九歲，他那裏會生得一個少年

① 請參看拙著石達開假詩考，此文收在太平天國史料辨偽集內。

② 詳見拙著太平天國史料裏的第一部大偽書——江南春夢庵筆記考偽，此文收在太平天國史料辨偽集一書內。